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3年第7期
（总第14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文化部修订《文化部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

动态关注

■北京增28处文保单位 近现代建筑首超古建筑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落户北京雍和园

媒体聚焦

■“高考季”热评高考作文

■电影“叫座不叫好”现象引关注

尖峰观点

■ 范春燕：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

■ 郑渝川：文化霸权与文化体制

海外视野

■ 法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手段多

■ 韩国近代文化街道游：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研究院之声

■ 我院与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商谈合作事宜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修订《文化部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

近日，文化部颁布最新修订的《文化部社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与2004年颁布的《文化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相比较，这次修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条例适用范围的扩大，《办法》不仅对原有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进行了调整，还新增了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的管理细则。

根据《办法》，社会团体在组织建设方面将获得相对较大的自主空间。从人员设置方面来看，副会长人数由原来“6名以内”的规定，改为“业务领域比较广泛的社会团体，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可适当增加副理事长(副会长)人数”。同时，《办法》不再要求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为文化部系统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而是放宽为“社会团体的理事长(会长)和法定代表人中应至少有一位文化部系统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但拟任人员须事先报文化部审核同意。此外，《办法》还取消了对国家现职公务员兼任社团工作职务的限制。

从监督管理方面来看，这次修订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力度，这不仅体现在《办法》要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变更要按规定事先报审，还体现在对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规范与控制。比如，《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社会组织的业务活动范围与责任权利，并对“搞收费评比或以评奖为名变相敛财”等违规行为予以明令禁止。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年6月17日)

■ 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

近日，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的总体目标为：以实施重大保护示范项目、建设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为着力点，构建“六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加强大遗址保护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大遗址保护展示水平，提升大遗址服务社会的能力。

《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为：完成新增50处重要大遗址测绘工作，加强大遗址基础数据信息化工作，初步建立大遗址文物信息平台；编制大遗址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和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使150处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完成率达到90%；持续开展长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保护工作，形成规模和联动效应；开展150处大遗址保护工程，完成25项重点保护展示工程；推进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和遗址博物馆建设，建成15个具有典型作用和示范意义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建设大遗址安防设施；创新管理

机制，完善大遗址保护网络。建立健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监测机制。

“十二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共150处，北京境内有周口店遗址、圆明园遗址、琉璃河遗址、长城、大运河等5处。

（据财政部网站摘编，2013年6月17日）

■ 文化部将取消和下放部分营业性演出审批

近日，文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取消和下放营业性演出审批项目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取消和下放4项行政审批层级。

《通知》规定，从2013年7月1日起，港澳台地区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来华进行营业性演出的，由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文化部不再受理相关项目的审批。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要确保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下放工作及时落实到位，做好接收工作。

港澳台地区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演出增加地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备案申请之日起5日内，出具备案证明。

参演文艺表演团体及个人、演出举办单位自原批准之日起至申请备案期间，有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被依法停止演出活动的，不予备案。不予备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同时，文化部还取消了文化主管部门对演出经营主体变更的审批，文艺演出团体和经营场所等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应在变更后30日内持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原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正(副)本，到原发证机关换发许可证，文化主管部门不再履行变更审批手续。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年6月17日）

(2)政策解读

■ 解读《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在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制院团该如何演好新角色？政府将被赋予哪些新职能？完善演艺业发展环境面临哪些新使命？近日，文化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回答了这些问题。

《意见》将“促进转制院团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转制院团要努力提升创新能力、演艺产品营销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知识产权经营能力，强化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创新。对于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的大型转制院团，要从中择优确立国有演艺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试点单位，加强指导，重点培育。对于中小转制院团，

《意见》提出，各级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平台，要积极为包括转制院团在内的中小演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支持中小转制院团发展。

政府需要完善对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的扶持政策，加大保障和落实力度。在财政扶持方面，《意见》提出，将转制院团纳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其他有关专项资金和基金，要向符合条件的转制院团倾斜，主要用于支持转制院团的发展和创新项目，并且将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意见》强调，要加大演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意见》为公共财政支持演艺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演艺基础设施建设，并支持一批重点文艺演出院线企业发展。

《意见》高度重视完善演艺业发展环境，力求从扩充资本来源、发展中介组织、强化人才保障等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强大的支撑体系。鼓励各类资本依法投资演艺业，将现阶段政府主导投资转变为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建立演艺企业集团、行业联盟等组织，充分发挥市场在演艺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演艺企业测评体系，推进演艺市场主体评价；在 5 年内完成对全国转制院团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分批次培训。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2013 年 6 月 14 日）

■ 旅游局副局长祝善忠解读《旅游法》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将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近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祝善忠就国家旅游局如何贯彻落实《旅游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首先，由于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服务、管理牵涉部门较多，国家旅游局将主要从 3 个方面来贯彻落实《旅游法》：一是会同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公共服务的意见，推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增加旅游公共服务投入，加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不断丰富旅游公共服务内容；二是通过推动旅游城市游客中心示范工程、旅游保险示范工程、旅游观光巴士示范工程等一系列旅游公共服务示范工程建设，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促进全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三是出台《旅游城市游客中心标准》、《观光巴士标准》等一系列旅游公共服务的标准，规范旅游公共服务的设施与服务。

新颁布的《旅游法》十分重视旅游安全，这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提高对旅游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高度重视旅游安全这项工作；它明确了政府必须管旅游安全的职责，进一步明晰了旅游经营者应承担旅游安全的主体责任。国家旅游局作为旅游安全工作的主管部门，将积极推动实施“安全旅游目的地”战略，建立健全旅游安全保障法制、体制、机制以及旅游保险保障体系，加强旅游安全风险防范和旅游应急处置能力。

此外，《旅游法》还明确把旅游形象推广上升到国家战略，将旅游形象推广纳入到

国家整体形象推广的战略布局，建立起国家层面的旅游形象推广工作机制，制定推广战略，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和各部门工作职责，实现宣传、文化、广电、旅游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效果叠加。

（据中国政府网摘编，2013 年 6 月 21 日）

■ 业内人士解读文化产业“营改增”

继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后，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也将于 8 月 1 日起纳入“营改增”试点。相比原来 5% 和 3% 两档税率，此次广播影视作品的税率征收标准为 6%。对此，业内人士进行了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指出：“文化创意产业最高税负可以减轻 60%，税率虽然较之前高了 1 ~3 个百分点，但是企业可以将提供相关服务过程中所采购的材料、固定资产，日常发生的办公费、设备维修保养费、水电费等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抵扣，预计近七成的试点企业税负将大幅下降。”在他看来，“营改增”税改后，试点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的相关文化创意服务能开具增值税发票，企业所提供服务产业链上的客户同样可以进行增值税抵扣，从而降低了客户购买相关服务的成本，避免了服务分包环节重复缴纳营业税以及相关产业链条上增值税环节的断裂。对于那些原营业税税率 5%、税改后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文化创意企业，其增值税征收率仅为 3%，税负水平大幅降低。

尽管“营改增”对文化创意产业利好，但是，企业减税环节主要集中于行业的中下游，在整个行业占比中约占七成，而在行业上游，以人力成本为主要支出的内容输出企业，其税负不减反增。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部分，创造内容价值也是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目前税收政策对此并没有补贴标准，这也成为政策扶持的一个空白区。

（据《中国经营报》摘编，2013 年 6 月 15 日）

2. 动态关注

■ 北京增 28 处文保单位 近现代建筑首超古建筑

在 6 月 4 日举行的“北京市 2013 年文化遗产日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透露，古崖居、文天祥祠、京张铁路、李大钊故居等 28 处古迹将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至 125 处。在此次最新公布的名单中，近现代建筑保护数量首次超过古建筑。王玉伟称，此次公布的名单中，涉及近现代建筑共有 14 处，包括京张铁路、辅仁大学旧址、西交民巷近代银行建筑群、通州近代学校建筑群等史迹，而古建筑遗址只有 13 处，显示了更加注重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趋势。

引人瞩目的是，一批工业遗产正式列入保护名单，表明工业遗产的文物重要性正逐

渐显现。此外，梅兰芳故居、李大钊故居被列入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玉伟透露，国家文物局对名人故居的控制更加严格：名人作出的重大贡献与发生的历史事件没有紧密联系的不被列入保护范围；名人的故居已经列入保护名单的，他的第二个故居不再列入保护范围；1949 年以后复建的名人故居也不被列入保护范围。

（据中国新闻网摘编，2013 年 6 月 5 日）

■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落户北京雍和园

6 月 14 日，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在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内举行揭牌仪式，这一文化产业领域的航母正式落户北京雍和园。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联盟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致力于为中国城市、地区的文化环境建设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相关一体化方案，为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联盟成员提供城市品牌规划、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投融资等系统性服务内容。它入驻雍和园，将有利于整合这里的文化资源，对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在揭牌仪式上，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张斌与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联盟还成立了“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贡品产业发展中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文化遗产发展中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传媒发展中心”三个分中心。中国城市文化产业联盟还为掌讯东方(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圣唐古驿创意文化园，三匚新华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授予理事单位标牌。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2013 年 6 月 20 日）

■《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13)》发布

日前，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团队编写的《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13)》在北京发布，报告从演出贸易、版权贸易、广播影视贸易、新媒体产业贸易以及会展业产业等几个方面对北京文化贸易的发展态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报告提出，2012 年，海外经典音乐剧中文版的引进和北京京剧院的“唱响之旅”海外巡演作为典范，为我国演出业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2012 年，北京广播电视节目贸易总额略有下降，贸易结构趋于合理。北京地区电影票房收入持续走高，国产片收入不敌进口片，民营资本在助力北京影视对外贸易方面作用显著。

报告显示，2012 年北京图书出版产业快速发展，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截至 11 月底，北京地区新闻出版业年度收入达到 619．3 亿元，同比增长 12.3%。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版权贸易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引进版权数量增长较大。

在新媒体领域，以广告为主要营收模式的网络视频行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同时，强调“多屏合一”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试水电视屏。2012 年，北京会展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全市规模以上会展单位实现直接会展收入 2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从业人员达 21.9 万人，比上年增

长 2.7%。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2013 年 5 月 31 日，记者成琪）

■ 上海电影节电影交易市场与项目市场闭幕

为期三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于 6 月 19 日顺利闭幕。本次电影市场以“电影交易市场”与“电影项目市场”的结构呈现。其中，“电影交易市场”共有参展机构及公司 819 家，来自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等海外展商包括第一次参展的大洋洲等海外机构比例占 42%。本次电影交易市场共吸引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18 名注册买家。电影交易市场共达成交易意向 750 多项，平均每个展商有 5 项交易意向。“电影项目市场”收到 224 个项目报名，有 8 个极具潜力的“中国电影项目”与 21 个“合拍项目”入围。

从交易市场展台的类型来看，本次展会全产业链的呈现更全面而丰富，包括项目市场的创意洽谈、开发，内容市场的版权洽谈，以及各种后期制作、宣传发行公司、品牌整合营销、法律服务、银行金融服务、电影出版、新媒体公司的特装展示。最终达成合作意向的创投项目一方面是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的呈现，另一方面，项目市场的内容也是对未来市场趋势的一种预示：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喜剧、黑色幽默、家庭伦理、惊悚片的密集报名，让我们对未来的市场有所窥倪。优酷、土豆从短片培养年轻导演，并在项目市场上推出了这些导演的长片计划，这也显示出中国电影市场与新人培养机制的丰富性初露端倪。

（据 21CN 网摘编，2013 年 6 月 20 日）

■ 成都举办国际非遗大会并通过《成都展望》

由文化部、四川省政府、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暨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10 周年纪念大会”于 6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成都成功召开。与会人士围绕“《公约》的成就：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变迁”、“清单制定与名录申报”、“平行领域：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世界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公约》缔约国履约经验”、“其他相关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五大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并达成多项共识。

大会最终通过的题为《成都展望》的成果文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未来社会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处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尤为宝贵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规避冲突和解决争端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为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贡献。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帮助应对自然灾害，尤其是在灾后重建、恢复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深入、积极推进，合理构建保护工作的有效机制，同时也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摘编，2013 年 6 月 17 日，记者许亚群）

3. 媒体聚焦

■ “高考季”热评高考作文

编者按：近些年来，每到高考前后，高考作文总是会成为媒体和大众议论的焦点，或有“好事者”分享零分作文娱乐大众，或有人上传满分作文令人拍案叫绝，但主流媒体通常都会流露出对高考作文、当下语文教育以及考试制度的种种担忧。可以说，高考作文确实是现实生活的“风向标”，人们对于高考作文的命题、评分标准、价值诉求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青少年学生的思想状态的关注将长期继续下去。

在高考阅卷结束不久，腾讯文化专门策划专题对当下的高考作文进行了一次措辞严厉的批判，在《好文渐绝种：谁阉割了高考作文的文学性》这篇长文中，作者历数高考作文的弊病。其一，高考作文的命题“逐渐开放了‘肉体’，依然缚住‘灵魂’”，出题逐渐远离现实，甚至粉饰太平，对考生进行励志洗脑，让考生写作时无法笔触残酷的现实，也无法挥洒自由的意志。面对这样的考题，学生的独立思想遭到禁锢，自由精神受到束缚，只能围绕着“大励志”范畴，用“意林体”来意淫幻想中的世界。于是，作文丧失了文学性，考生则失去了自由性。其二，“体裁受限：诗歌被打入‘冷宫’，小论文大行其道”，经典的文学体裁遭受打压，而模式化、快餐型的小论文火热，这反映出出题人迎合社会趋势的心态和忽视了文学本质的草率。其三，“作文异化：培训机构与教师押题，考生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写作文逐渐成了技术活。其四，“学生文字能力下降”，养成“不读书不思考的一代”，这是更为严重的后果。文章不无悲哀地指出：“高考作文还不如八股文。八股文尚且出过很多大家，而高考满分作文不过是考生个人的一次昙花秀。”(据腾讯文化，2013 年 6 月 21 日)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对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也很不满意，他认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材远离现实生活，立意拘泥，空间狭窄，思想浅薄之至，抑制了学生思考、想象和语文多方面能力的展示与发挥。他同样也主张，应该通过高考这样的“指挥棒”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关心现实、思考现实、改变现实，培养他们热情拥抱现实的人文精神情怀。(据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炮轰高考作文题：思想浅薄之至》，人民网，2013 年 6 月 8 日)学者张千帆则表示，作文应该考学生的理解、立意和逻辑思维以及文字能力。国内某些高考作文题目本身立意较高，但是实行分省命题的各省水平参差不齐。或许作文能力根本不应该通过考试来体现，至少目前设计的考题和评分标准均难以客观评价考生的水平。他甚至主张，“在解决考题和评价标准公正性等问题之前，应该停止作文考试”。(据李北辰：《拷问高考作文》，《华夏时报》，2013 年 6 月 21 日)

也有文章认为，高考作文题不仅应该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也应该为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传递“正能量”作出应有的贡献。(据余闻：《我

们需要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光明日报》，2013 年 6 月 14 日）还有文章提出，要“让高考作文成为精神暮气的价值补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据耿银平：《让高考作文成为精神暮气的价值补丁》，长城网，2013 年 6 月 18 日）而著名学者许纪霖则认为，如今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能让人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定位不准——语文和作文到底是考学生的思想，还是考学生的语言文化及作文能力？他建议，“中国应该像法国一样，有一门考试专门是考哲学的，考你对社会的认识，还有一门是专门考文学能力的，把两者分开”。（据《许纪霖评 2013 高考作文：高考作文命题陷入了困境》，搜狐教育，2013 年 6 月 7 日）

社会各界对高考作文批评激烈，但这种火热的关注也可能会带来更坏的影响，导致命题人员更加胆小保守。而媒体和社会补习机构的猜题则会使命题人员为了避免“意外”而不得不剑走偏锋，使题目“变冷”，最后吃亏的还是考生。所以也有人呼吁，社会不要干扰高考作文命题，应当有相关的严厉措施，禁止媒体和社会补习机构猜题，什么时候社会不关心高考作文了，语文教育的情况可能反而会变好一些。（据吴非：《高考作文：命题与阅卷都成难题》，《新京报》，2013 年 6 月 15 日）

■ 电影“叫座不叫好”现象引关注

编者按：端午节假期，电影《天机·富春山居图》上映，这部电影的票房轻松过亿，然而广大影迷却认为该片实为彻头彻尾的烂片。那么，高票房与差口碑之间的强烈反差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观众有审丑的“逆反”心理，还是因为有大牌明星的吸引力？是因为制片方利用了“话题效应”，还是因为他们钻了排片的空子？一时间，国产电影“叫座不叫好”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思。

恶评如潮但票房飙升的《富春山居图》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电影，有人认为它开创了电影营销的一个全新模式。在艺术上，它几乎颠覆了类型电影创作的所有法则；在营销上，它则成功用“看你到底怎么烂法”激发了观众集体“审丑”的欲望，其宣传原则就是“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睬”。（据段菁菁：《骂声中的新营销模式 电影市场“不识好歹”》，《北京晚报》，2013 年 6 月 17 日）

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在第 16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浪潮论坛上，广大电影人对此进行了分析解读。台湾制作人李烈认为，一些口碑很差的电影之所以获得出人意料的高票房，是因为大量负面评价反而引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情，“讨论成那个样子，变成一个流行，那我非看不可，不看就跟不上这个讨论了”。但这种现象似乎是中国所特有的，在国外，一旦新片出现负面评价，它照样也会遭遇票房滑铁卢。王中磊认为，这说明内地观众对于国产电影有了和好莱坞大片不一样的选择标准，不满足于跟自己有距离感的东西，而需要更多的文化参与。何平则认为，消费话题现象的出现，说明本土电影市场并不成熟，但他相信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观众很快就会变得理性，而这种理

性势必会在市场上反映出来。(据邵岭:《为何观众越批评影片越卖钱》,《文汇报》,2013 年 6 月 19 日)

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奇观”并不能表明观众缺少理性的判断力,只是在他们观影习惯尚未成熟时,更依赖电影所产生的娱乐效果。在观看烂片的过程中,观众可以通过嘲笑编剧的“低智商、没常识”来获取一种对比产生的优越感,日常生活中由激烈竞争带来的挫败感和压力都能够在这种对比的过程中烟消云散,因此,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并释放出压抑已久的刻薄。(据《<富春山居图>:“烂片”票房逆袭,恨之深爱之切?》,东方网,2013 年 6 月 23 日)导演管虎的话也很有道理,他提出,“现在的观众不够成熟,问题出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引领,一味屈从了”。(据段菁菁:《骂声中的新营销模式 电影市场“不识好歹”》,《北京晚报》,2013 年 6 月 17 日)

此片能获得高票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排片的门道上。影评人释凡指出,现在好莱坞重量级大片,都被要求提前公布档期。于是,国产影片就开始找空子,避开好莱坞影片上映。《富春山居图》上映后,占了几乎 40% 的排片。虽然口碑没那么好,上座率没那么高,但因为没有竞争,就会一直棒下去。并且,今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质量和数量相对较低,此外,国内影片在“宣发”上也要比进口片占便宜。(据李坤晟、浦奕安:《烂片也狂赚 思考国产电影票房何以持续井喷?》,新华网,2013 年 6 月 21 日)其实,这种排片的“学问”,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正是因为“国产片保护”政策才助成了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产生,我们要鼓励一个人去成为一个能拍出好电影的好导演,而不能诱使大家一味地去研究排片政治学、排片经济学、排片社会学。(据于德清:《重要的不是烂片,而是排片》,《成都商报》,2013 年 6 月 19 日)

对于《富春山居图》的火爆我们不应该去学习和效仿,“负面营销”的“成功”绝非长久之计,如何让观众能够怀着赞美的心态去观赏一部影片,才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场导向。(据张薇:《<富春山居图>越骂票房越高 国产电影怎么了?》光明网,2013 年 6 月 24 日,)中国影片要摆脱“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在商业片称霸影坛的时代里,就必须从玩技术、玩阴暗、玩噱头的误区中跳出来,赋予影片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大爱情怀。(据张立美:《银幕为何屡现骂红》,《北京晚报》,2013 年 6 月 20 日)

■ “微小说”获奖引中国反思“长度崇拜”

编者按:近日,美国短篇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击败了包括阎连科在内的其他 9 位作家,获得了 2013 年布克国际奖。此番国外短篇小说的成功与我们长篇小说的“败阵”引起了国内相关人士的反思:长期以来,“长度崇拜”愈演愈烈,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日益没落的短篇小说腾出一点生存发展空间了?

此次短篇小说的大获全胜给国内文坛以很大的启示,短小微型的小说不仅可以成为文学,而且可以成为荣获世界大奖的文学。评论家金哲认为,西方文学的评价体系目前

已经由以往的“厚重”和“深刻”，慢慢地趋向于看作家的“持久创新力”和“发展能力”(曼布克国际奖的评奖宗旨)，而写几个字的小说，显然是创新力的一种体现，相比之下，还陷于“长篇崇拜”的国内一些作家的文学观，就有一点过时了。(据郦亮：《内容是王道，“长篇崇拜”应适可而止》，《西安晚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将“虚构性”和“叙事性”、“长度”和“难度”当做判断文学优劣高下的标准，认为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和文学地位的高低，最终取决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这种偏见会导致“体裁歧视”和对小说艺术的误解。文学体裁之间是平等的，并无高低尊卑之分；任何一种体裁的写作，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都可以证明作家的才华，都能产生堪称经典的作品和第一流的大师。鲁迅、汪曾祺等人没有长篇小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据徐鹏飞：《“长篇崇拜”的盲目及后果 别误读了小说》，《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4 日) 长度并非拯救文学品质的良药，文学品质的高低、文学成就的大小、文学创造力的强弱，与篇幅大小、体裁形式并无直接关系。片面地追求长度反映出的是文化界的浮躁心态、理念错位和机制失范，长此以往，容易导致文化艺术的大量“注水”和恶性膨胀，我们不得不对此高度警惕。(据杜浩：《文学写作需谨防“长度崇拜”》，《中国文化报》，2013 年 6 月 21 日)

短篇小说没落而长篇小说受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要说的话太多，历史的悲剧、社会的灾难、家庭的灾难、民族复兴的需求都被小说承担，承担的东西越来越多，一下子篇幅就不够了。另一方面，社会逐渐浮躁，读者越来越急于看一个人物的命运，所以从看语言转为看故事情节，而短篇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更大的原因恐怕是经济上的，因为长篇小说能为作家赚取更多的稿酬，并且在各大文学奖项的评选上，长篇小说也更受青睐。(据刘悠扬：《短篇小说在中国》，《深圳商报》，2013 年 6 月 19 日)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家经验资源的枯竭、思想能力的低下、文学创造力的贫乏。短篇小说作为“手枪”，考验的是创作者精雕细刻和别出心裁的能力；而长篇小说作为“大炮”，则对创作者有更多、更高的要求，现在有不少作家事实上是在强作长文。(据徐鹏飞：《“长篇崇拜”的盲目及后果 别误读了小说》，《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4 日)

对于作家而言，作品长短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不能为了长度而去凑长度。作家鲍十认为，好作家并不会被小说的篇幅局限，也不会被小说额外带来的所谓名利诱惑，创作长篇小说时必须涤去浮躁之心，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文学。(据何晶：《值得警惕的“长篇崇拜”》，《羊城晚报》，2013 年 6 月 9 日)

4. 尖峰观点

■ 范春燕：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

总的来讲，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狭义的人文艺术政策转向广义的泛文化政策。文化政策越来越不再特指那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狭义的人文艺术政策，而是泛指那些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交织在一起的广义文化政策。而且，随着国家文化政策越来越追求人文艺术之外的目标，针对人文艺术本身的国家扶植也就逐渐弱化。

二是从“文化产业”转向“创意产业”。从概念本身来看，创意产业主要从产业内部发展动力的角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产业概念的紧张关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狭义文化政策和广义文化政策之间的矛盾。当从其实际运行来看，这种辞藻的变化并没有真正解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在创意文化辞藻中，文化和产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又有了新的表现和发展：文化创意理应具有“创造性”的内在品质，但在实际中却要服从市场规则，总是要求可交付和可计量的成果。要解决这种矛盾，创意产业就应该“通过分配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生产来获取利润”。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很难做到。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和创意产业之间也存在悖论。知识产权在提供个体创造力的同时，也损害了已经存在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三是从“文化例外”转向“文化多样性”。美国作为已经占据制高点的文化超级大国，必然致力于推行文化领域的“自由贸易”，而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英、法、澳、加等第二集团国家来讲，抵御美国文化的攻势、保护国内市场就成了对外文化政策的基调。“文化例外”反映了它们这种文化保护主义理念的口号。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第二集团相继以“文化多样性”代替之前的“文化例外”作为新的对外政策理据，提出弱势文化对维护全球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转变反映了第二集团从一种被动的保护型战略转向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发展型战略。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给我们的启示有：1. 美国经常标榜自己的文化政策是“无为而治”，但这种所谓的放任和不干预政策主要是在狭义文化政策领域，也就是国家在人文艺术领域的投资少、监管弱，文化艺术机构主要依靠企业赞助和社会捐助生存。而从广义文化政策的视角看，美国的文化政策不仅一直都在，而且无处不在。美国的经验正是在于把文化、经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无缝链接，在于其全方位的“作为”。2. 如果文化单纯是作为盈利的手段去迎合市场和需求，那么最终就会沦为经济的附庸，从而失去杠杆功能。只有保持着情感结构和民族特性的文化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起到助推器的作用。此外还要处理好两种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文艺术领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植，不能任其在市场中失去文化的内核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也要把具有当代中国品格的文化融入经济和外交政策中，构建可持续的广义文化政策。3.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下，其他国家只能实行不同程度的文化保护政策，但单纯采取守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的空间越来越小。适当发展走出去战略，组建主导性的文化跨国企业，已经成为第二集团的共识。

（据范春燕：《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西方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及其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 郑渝川：文化霸权与文化体制

法国知名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论美国的文化》一书，承认了世界文化霸权从法国转移到美国的事实，并试图解读这背后的原因。美国没有文化部，也没有专司振兴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产业的其他“主管部门”，却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美国文化体制要比其他类型的文化体制，更能促进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上形成既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美国政府在文化中的作用，基本上是间接发挥的，但美国政府、政界对文化仍拥有很强的引导力和塑造力。如邀请大批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参加总统就职仪式，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强化了美国公众对文化艺术特别是高雅艺术、严肃文学的认知。而以美国国家基金会为代表的资助部门发放的资助虽然有限，却会对慈善组织、企业家的募款去向形成影响。

美国文化体制的运转，更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公民社会。在美国，文化艺术扎根于大学，全美 4182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700 所美术馆或专业画廊，300 个独立的大学电台，超过 2300 个演艺中心。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舞蹈演出都是专业水准的，美国的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到好莱坞发展，就自然会带动好莱坞电影产品的创意水准和艺术质量，这才是美国文化霸权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原因。

在美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可以享受到跟慈善基金会一样的优惠待遇，而非公立的博物馆、乐团、芭蕾舞团、剧院、图书馆也被承认具有公益性而获税费减免等待遇(尽管这些组织仍可以开展部分营利活动)。由此带来了两大利好，一是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创造了可观产值，是美国今天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领域，且吸纳了数百万就业人口；二是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且因这种软实力并非政府“打造”，而让法国等其他有意阻拦其作用发挥的国家很难对之正面遏制。

（据郑渝川：《文化霸权与文化体制》，《深圳特区报》，2013 年 6 月 14 日）

■ 刘立峰：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1 年，城镇化率超过了 50%，城镇人口总数已经接近了整个欧洲的人口数，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阶段。但是，与此同时，传统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为了解决逐步蔓延的城市病，我们需要走更加均衡的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应该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推动这些重点城镇发展成为 10—50 万人的中小城市。要大力促进城市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引导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将能源、矿产等深加工环节更多地留给中西部城镇，税收更多地留在本地，促进这些城镇的产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推动人口的本地城镇化。

我国的城镇化都是按照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向城市面积单向集聚和集中，城市向城郊及农村逐步拓展与扩张的方向进行，农村的资金供给陷入日益窘迫的境地。只

有通过土地政策的必要调整，才能引导社会资源和资金向农村的流动，促进新农村开发与建设，推进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部分转让给城镇居民，将大大促进城镇资本向农村的涌流，推动农村发展。我国地方政府近年负债率激增，有必要严格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要实现“法制融资”和“阳光融资”，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监管体系，提高包括债务在内的政府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进行融资，但是地方政府既是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者，又承担具体的城市建设责任，在这两者之间很难找到平衡，以至于出现房价飙升、遍地强拆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地方政府退出对城市建设的直接参与，政府不再直接获得土地收益，形成土地一级和二级市场的联动。为适应新型城镇化需要，行政区划和建制调整需要给县域经济体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降低城市新区的设立门槛，撤乡并镇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受影响，避免人口过多和面积过大的乡镇出现，尽可能保留边远乡镇和交通不便的乡镇。

新型城镇化要从根本上抛弃绝对经济利益导向的大拆大建，更多地从城市文化传承和城市记忆延续的角度考虑城市的改造。城市政府要防止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传统的破坏与湮没。每个城市都应出台相应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提高历史建筑的保护率。不仅要保护历史文化遗存自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应在城市中设立禁止开发区域，明确在该区域内禁止任何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建设。

（据刘立峰：《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13 年第 5 期）

■ 张天潘：另一种“东方主义”——好莱坞的中国元素背后

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成为人人虎视眈眈的香饽饽，对于海外片商特别是好莱坞片商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在这个背景下，好莱坞电影构筑出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在这些中国元素的背后，是新的“东方主义”的成型。与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不同，其“异域”与“敌视”的对立特质有所松动。在当前语境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其中“敌视”一面被消解，以去政治化和正面化的“示好”构建了一种他者视域中的想象。

首先，这种中国元素仍然不脱东方女性身体消费的窠臼，《卧虎藏龙》中的章子怡、《环形使者》中的许晴、《生化危机 5：惩罚》中的李冰冰即是典型。其次，好莱坞电影中中国元素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还是器物上的，无论是让西方流连忘返的建筑与自然风光，还是强势插入的中国品牌，其实都缺乏文化上的真正感召。这不仅仅是西方人的偏见，更是因为我们自身软实力不过硬。

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票房成为指挥棒，在逼迫片商们正视东方，国家关系间的“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其他的一切靠边站。另一方面，“合拍片”新政策要求：“中方出资比例一般不少于 1/3；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需要在中国取景。”这个政策的限定加上经济和市场的三元素，将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片子出现。于是，过去人们所担忧的“文化入侵”与“文化霸权”在电影中表现得越来越少了，相反，

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示好展露无遗，甚至示好得过火。

这种示好与中外有别的差异电影版本，都在说明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一种新的东方主义正在电影与电影之外形成。在政治与意识形态让位之后，是经济与市场的风光无限。东方尤其是作为代表的中国，富裕但不一定文明、美丽但并非美好，它不再是贫困落后愚昧之地，而是像暴发户式的让西方人又爱又恨。经过一番刻意营造，让东方人自己喜欢的东方形象被展示出来——只要他们能兴高采烈地走入电影院，贡献数以亿计的票房。

（据张天潘：《另一种“东方主义”——好莱坞的中国元素背后》，《南风窗》，2013 年第 13 期）

■ 饶曙光：微电影：新的电影形态、新的产业业态

微电影正在悄无声息地重新定义电影以及原有的电影版图。微电影制作主体多元化，传播途径多样化，使得微电影创作和生产变得日益大众化，成为人人都有可能参与、随时都可以分享的“草根的艺术”、“日常生活的艺术”。微电影以“微”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模式，对原本由院线垄断的播映渠道进行了一次技术性同时又是革命性的颠覆，使得电影艺术以更平常、更随意、更休闲的姿态走近接受者。微电影的诞生动摇了大电影的地位，它以其短小精悍、传播性强的优势，必将在新媒体时代异军突起，成为新的文化时尚、文化时髦。

但是，到目前为止，以微电影为代表的自制内容还无法形成规模盈利效应，微电影行业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链，广告收入是微电影赖以生存的主体收入。微电影最初可能起源于广告，但绝不能止于广告的高级形式。真正意义上的微电影，必须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彩的人物对白、独特的电影画面等一部大电影的所有要素。要吃到微电影这块大“蛋糕”，微电影必须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找平衡，寻找到在功利性的商业表达之外，顺畅地实现创作者自身人文关怀和审美表达的途径，是微电影实现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微电影对传统电影、传统电影产业具有重要的支撑、补充作用。微电影可以为传统电影培养新生力量、储备后备人才。微电影对于中国电影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可以与大电影产业形成良性互动，成为大电影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三五年内，微电影将形成千亿元的产业规模，成为文化产业新的重要增长点。然而，微电影的路要想走得更远、更好，就必须不断激发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引入国家对微电影的审查和规范，保护好版权。

（据饶曙光：《微电影：新的电影形态、新的产业业态》，《当代电影》，2013 年第 5 期）

■ 晏绍祥：道德衰败：一个神话?

当下流行的“道德滑坡”的说法很值得商榷和质疑，所谓古代道德高尚，此后道德不断衰退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当今中国道

德滑坡严重，表现为正义得不到伸张，助人者蒙冤赔偿；路见伤者担心惹火上身，只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些表述给人的感觉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彻底崩溃。但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所谓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溃的担心。

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例，为后世史学家们所歌颂的伟大政治家其实在道德上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与道德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近代欧洲而论，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与古代比较，今人的道德，在很多方面较古代有很大的提升。妇女的赢得平等地位，奴隶制的废除，职业的相对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应当无人否认，早已远远超越古代。所谓所有人一心为公的道德高尚的时代，不过是后来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就中国古代而言，儒家所谓的古代大同，早已遭到法家的解构，那不过是儒家的道德乌托邦。

我不认同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严重衰退，而过去曾经道德高尚的观点。首先，什么时候是道德高尚的时代？所谓的道德高尚，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没有普遍绝对的标准答案。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世纪 80 年代、甚至民国都不是人人道德高尚的“黄金时代”。当今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化和转型之中，传统的道德体系确实有不少已经崩溃或者陷入危机。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在提升，人们对于当下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进行猛烈地批判本身，就反映了社会整体对提升道德水准的要求。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道德高尚之人，也从来都不缺道德败坏之人，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些方面的问题，就一味指责当今的道德滑坡，甚至为了某些不堪的目的，主张回到那本不存在的道德高尚的过去。重要的是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过高估计了道德的作用，反而会掩盖我们制度和法制建设中的某些缺失。人类的道德会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地变革和更新，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模糊的、言人人殊的所谓传统道德，而是现代公共道德，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其基础是现代法制体系和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

（据晏绍祥：《道德衰败：一个神话》，《南方周末》，2013 年 6 月 13 日）

5. 机构动态

■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

6 月 8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国家外国专家局支持、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承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文化产业业界精英和北京师范大学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约 200 余人出席了论坛。来自政府、商业界、学术界和传媒界的诸多中外精英围绕“国际传播环境下中国文化价值

应用”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与有效路径”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2013 年 6 月 9 日，记者毛俊玉）

■ 中国政协文史馆西沐文化产业研究院成立

5 月 30 日，中国政协文史馆特别批准成立了中国政协文史馆西沐文化产业研究院，同时举行了双方的签约仪式。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赵珩表示，西沐文化产业研究院的成立是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新探索，它不仅对促进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有所贡献，还是新时期中国政协文史馆服务社会的一种新手段，同时也将为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项目策划及运作的咨询支持，意义重大。西沐表示，研究院将围绕国家文化艺术创新战略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努力把研究院建成文化艺术产业的思想库、信息库、人才库，推动文化艺术产业市场的体系化建设并将着重研究与突破长期制约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政协文史馆西沐文化产业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始正式进军中国文化产业。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2013 年 6 月 3 日）

■ 上海师范大学筹建“中国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

6 月 6 日，为筹备成立“中国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城市化与生态文明：芒福德遗产的当代意义”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邀集了来自国内外各高教科研机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共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态思想及其当下启示。围绕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和现状、芒福德城市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与人本主义城市规划观等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无论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对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方向选择来说，芒福德的著作及其思想主张无疑具有十分显著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此时发起成立“中国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试图系统地译介芒福德的著作，对他的城市思想进行深度研究阐发，是适恰其时之举，是中国学术界对大时代需求的一种回应。

（据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网站，2013 年 6 月 6 日）

■ 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召开发展规划会议

6 月 15 日，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召开发展规划会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杨庆存、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校长韩震教授，社科院文学所陶文鹏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赵敏俐教授，基地主任韩经太教授，副主任郭鹏教授、张华教授、杨建国教授，基地兼职研究人员程龙博士等参加了会议，为基地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基地的各位专家就目前研究的课题和现状与杨庆存副主任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与会专家强调，基地要立足国际，从国际交往的角度出发，尝试与其他国家的首都文化进行比较和借鉴；强调对文化影响力的研究，注重中华

文化对外的影响及世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且要进一步加强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据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网摘编，2013 年 6 月 21 日）

■ 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成立

6 月 4 日，正在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在墨西哥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联合声明》，声明提出“双方对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作为中国在拉美地区建立的首个中国文化中心，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显示了我国对发展与作为文化大国的墨西哥之间的关系的重视。2012 年 10 月 25 日，中墨双方完成了外交照会的互换手续，中国文化中心在墨西哥正式注册。目前，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的改建工程正在有序进行，预计将在年内向公众开放。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将大大增进中墨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墨之间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墨西哥民众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6 月 4 日，记者王新明）

6. 海外视野

■ 法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手段多

法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 38 处，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共有约 4．4 万处，这些散布在法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建筑是法国人的骄傲，每年吸引全球游客逾 8000 万人次，为世界首位。而在遗产保护方面，法国也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首先，法国从法律层面不断充实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1877 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出台了有关遗产保存的若干章程，规定国家必须参与历史古迹保护工作。由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1913 年，法国立法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进行分类的机构，并且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被确认为历史古迹的私人财产第一次跻身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与公立机构享受同等待遇。1930 年自然遗产首次以法律形式受到保护。1943 年，历史古迹四周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被法律划定为受保护区域，任何人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随意改动原建筑的风格。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乱拆乱建行为，避免了古建筑陷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尴尬。1988 年，政府以免除继承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所有遗迹向公众开放。自 2003 年以后，政府对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下放到地方，并进一步扩大公共开放程度。

其次，法国政府注重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说，文化遗产行业能为法国创造大批就业机会和大笔收入，这对于国家经济复苏会起到支撑作用。2013 年，法国政府在编制预算时，计划为文化、科研及传媒产业投入

35．5 亿欧元，其中，文化遗产保护费用就占 7．76 亿欧元，属于文化遗产保护之列的历史性建筑保护费用占 3．22 亿欧元。

第三，法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出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个人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数额 66% 的税收优惠，企业则从营业税中扣除相当于捐款 60% 的税款。此外，政府还简化了遗产保护性基金会成立和运作的手续，并给予税收优惠支持。

第四，对于发展旅游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许多文化遗产单位依靠常态化运行机制，进行自我保护。

第五，法国还重视文化遗产推介工作，教育每个人发自内心地维护这笔无价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近和享受文化遗产，增强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1984 年，法国率先推出了“文化遗产日”活动。在每年 9 月的第三个周末，法国所有的博物馆、艺术馆、总统府、市政厅和城堡等都免费向游客开放。

（据新华网摘编，2013 年 6 月 17 日）

■ 韩国近代文化街道游：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历史悠久的老街、古城一直都是各国游客钟爱的景点。如今，一种名为“近代文化街道游”的旅游项目在韩国悄然兴起。韩国大邱市的一条近代街区，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法完美变身，成为一年吸引 5 万余名游客的著名景点。

韩国大邱市中区的北城路位于城市中心，诸多景点已经具备一定的知名度，此外，北城路这一街区几乎没有受到现代城市开发的影响，完好地保留了近代以来的街区形态。数年前，一些韩国民间活动家看到这一街区潜在的旅游价值，希望以其为模板，开创一种借助民间历史文化资源重振街道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世界著名城市最有名的观光地点往往都是在原来的市中心，并不是因为这里有最雄伟的建筑，而是因为这里保存着最淳朴的民间历史。

2008 年起，在大邱街道游项目负责人的策划、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人们开始尝试把街道里的故事、传说与景点、民俗结合起来，培养解说员为游客讲故事，并将街头巷尾的建筑物里发生的真实历史故事标注在墙面上，为街道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原来只有穿着韩服的老人才来的小巷子，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来玩，变得充满活力。如今，北城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还获得了“韩国观光之星”的称号。

现在，大邱市对“近代文化街道游”还有进一步的规划。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土黄色标示出历史上街道的走向，并在街道周围建筑的墙壁上画一些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壁画。此外，他们还将培养 100 名“文化解说员”为游客讲故事。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6 月 6 日，宋佳烜编译）

7. 研究院之声

■ 我院与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商谈合作事宜

2013 年 6 月 26 日，我院与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座谈会，商谈合作事宜。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教授，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德胜教授与到访的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Marvin Marcus 教授、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助理教授马钊进行了座谈，共同商讨未来的合作项目。文化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乔卉、专职研究人员陈国战、符鹏、盖琪、蒋璐、郑以然出席了会议。

陶东风教授首先介绍了文化研究院的概况，他从职能范围、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我院的工作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我院的定位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首都文化战略提供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是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共同建设的研究咨询平台。研究院成立以来，成功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论坛和工作坊，出版了《文化研究》、《文化决策参考》和《北京文化通讯》等刊物，在推动学术研究、城市文化交流、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德胜教授简述了我校的教学科研情况，并特别对我校的对外交流工作做了详细说明。他表示，我校积极投入资源用于对外交流，以扩大师生视野、提高我校的国际声誉。目前，我校已经与世界上 100 多个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学生互换、双学位培养、短期英文授课等形式，支持师生的对外交流。随后，邱运华教授概括了我校对外交流的政策框架和我院在对外合作方面的宏观构想，表示对双方的合作充满期待，校方和院方将在各方面给予支持。

随后，Marvin Marcus 教授代表东亚研究中心感谢了我院的邀请，并对中心情况及合作期望进行了介绍。他说：东亚研究中心集合了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的资源，是密苏里地区东亚文化研究的重镇。本次来访的目的是希望与文化研究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整合双方的东亚研究资源，推进跨国、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随后，马钊教授介绍了华盛顿大学的对外交流政策和夏季课程的情况。他指出，华盛顿大学有诸多学科的学术资源可以和我院的研究方向对接。两位学者表示，他们对我校的开放精神和学术气氛印象深刻，对双方的合作前景非常乐观。经商议，双方决定起草合作备忘录，并尽快落实具体的合作方案。

最后，陶东风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双方的座谈愉快而富有成效，期望在未来的合作中打通学术研究、学生培养和城市决策参考三个方面的工作，更好地推进东亚研究的发展。

（本期摘编人：程振翼）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